

● 经济社会卷



珠海文化大讲堂

(2007~2010年讲座精编)

Zhuhai Culture Forum

徐惠萍/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经济社会卷



珠海文化大讲堂

(2007~2010年讲座精编)

Z h u h a i C u l t u r e F o r u m

徐惠萍/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编委会

主	编	徐惠萍			
编	辑	张献斌	何沁兰	曹自德	刘楚珊
		李丛	刘洁琼	张楠	王宇凝

主办单位

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

协办单位

珠海市文体旅游局

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珠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珠海市教育局

珠海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

珠海市新华书店

中共香洲区委宣传部

中共金湾区委宣传部

中共斗门区委宣传部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珠海城市职业学院

承办单位

珠海特区报社

珠海广播电视台

珠海市图书馆

特别鸣谢

珠海远大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恒富阳光酒店

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公益性文化事业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是评价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方面，是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重要基础。珠海文化大讲堂自2007年11月创办以来，举办讲座近200场，成长为最受珠海市民欢迎的文化品牌之一，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要做到以人为本。要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作为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根本目标，提供群众最需要、最渴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珠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市民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不仅仅在于自娱自乐和载歌载舞，而是需要更能提升自身文化内涵的文化大餐。珠海文化大讲堂正是立足于市民的这一需要，定位于高端公益性文化论坛，邀请国内外各个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亲临讲学，让市民与大师面对面，在满足群众文化渴求的同时，也提升了市民的文化修养。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要坚持全民共享。让人民群众享受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珠海文化大讲堂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免费、免票的公益原则，面向全体市民开放，不设任何门槛，不以任何物质回报为代价，无偿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无论在职员工或退休人员，本地市民或外地游客，均可自由地成为珠海文化大讲堂任意一场讲座的听众，人民群众在这里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和被服务对象。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要突出精品意识。要注重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吸引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才能形成人人享受文化成果，人人参与文化活动的良好文化氛围。珠海文化大讲堂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

发，既开设有历史、艺术、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专题，也安排了养生、教育、理财、励志等方面的讲座，既能满足市民对星空的仰望，也能解决百姓对脚下的关注，所以讲座场场座无虚席，遇有于丹、阎崇年、钱文忠、梁文道等文化名人设坛开讲，则常常观者如云，受欢迎之程度可见一斑。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要强调持之以恒。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永恒的主题，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绝不是一时之需，而应该成为长久之计。办一场精彩的讲座不难，难的是场场精彩，常年精彩。珠海文化大讲堂创办四年多来，每周一场，风雨无阻，不见不散，已经成为珠海市民周末文化休闲的一种习惯。在国内众多的地方讲堂中，珠海文化大讲堂的这种高密度、持续性是不多见的。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效益明显，市民广泛欢迎，珠海文化大讲堂应该越办越好。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正因为如此，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才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和标志。希望珠海文化大讲堂再接再厉，为建设幸福珠海添砖加瓦，为探索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新路径再立奇功。

中共珠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陈英

2011 年 12 月 27 日

目 录

CONTENTS

经 济

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	周其仁 / 3
胡润眼中的中国企业家	胡 润 / 28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刘 伟 / 40
危机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危机	王 庆 / 53
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展望	李佐军 / 66
高房价真的会降下来吗?	王福重 / 85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与横琴开发	冯邦彦 / 101
未来 5~10 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趋势	迟福林 / 121
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叶 檀 / 139

社 会

民间信仰与岭南文化	陈春声 / 165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王 石 / 179

中国社会问题分析	周孝正 / 189
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动	王绍光 / 205
西方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韩冬雪 / 214
关于台湾问题的思考	张 磊 / 228

城市建设

欧美滨海城市设计理念及对珠海的启示	陈可石 / 237
珠海的海洋文化品牌与生态文明建设	王经伦 / 245
双城同源，同城有期	
——珠澳历史、现在与未来	吴志良 / 258
城市旅游发展的驱动力	保继刚 / 274
未来智能城市的远景	约翰·邦 (Johan P Bang) / 281



经 济



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

周其仁



主讲人简介：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著作有：《改革面临制度创新》、《农村变革与国民经济发展（上、下）》、《数网竞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变迁》、《收入是一连串事件》、《挑灯看剑——观察经济大时代》、《世事胜棋局》等。

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是危机触动改革，走的是 30 年实事求是的道路，经过 2008 年和 2009 年的调整，中国会走向平稳的持续增长。

今年（2008 年）是改革开放 30 年，同时又是中国经济增长遇到很多特殊困难的一年，我想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回顾改革开放，让大家了解改革开放不是安安稳稳坐在房子里面享受，是被国内外形势逼出来的；二是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使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变化；三是讨论中国改革开放巨大的成就及其挑战；四是展望今后和未来。

首先讲讲什么叫“逼出来的改革开放”。从 30 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开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其实，这场变革不是 30 年前突然开始的，它有很多预演和准备，有一个潜伏期。大家记得我们国家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搞“大跃进”，搞“一大二公”，结果因为天灾人祸闹饥荒，导致和平时很多人非

正常死亡。最后老红军反映到北京，才引起中央的高度注意，中央派人下来了解情况，反馈的情况是村村都有穿白鞋的，有个村支书得了癌症，到生命的最后关头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

按照道理，如果没有大饥荒，在和平年代人口本应该增长才是，但是当时我们的人口绝对数字在下降，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针对这一情况，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规定了“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措施，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到农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安徽饥荒最严重的地方不是5%，而是百分之百地把土地划到农户，农户们说这是“救命田”，随后河南、甘肃、内蒙古等地都开始包产到户。但是后来形势变又开始批判这种做法，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受到冲击。尽管如此，毛主席把自留地还是留下来了，为以后的制度性变化奠定了基础。这个在我看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潜伏和准备。

现在讲讲什么是改革。所谓改革，按照当时的做法来说，就是把包产到户推广到全国。当时在公私分明、“一大二公”的年代，想想可能都是犯罪，更不要说做了，现在回想起来恍如隔世。记得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看到全国因为粮食饥荒导致饲料减少，认为恢复老百姓的体力和营养要大力养猪，于是他回到家乡上海搞调研，看看怎样才能把猪养得更好。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调查报告里，陈云非常细致地记录了养猪的方法，甚至母猪下崽一天换几次草都写得清清楚楚，最后的结论是要恢复母猪的私养。虽然最初的包产到户很短暂，后来又几经折腾，但毕竟埋下了一个种子。这便是农村改革的由来。

接下来讲讲什么是开放。与改革一样，我们的开放也是逼出来的。1960年、1961年，国内饥荒导致大家活不下去，最多时有10万人聚集在宝安也就是今天的深圳要逃港，其中有6万人跑了过去，但大多数被港英当局用武力遣返，直接导致了中英冲突事件。我们主要通过加强边防和海关监管控制、提高阶级斗争这个弦来处理。这件事对社会主义国家冲击很大，人们会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人往资本主义制度那边跑呢？当然冲击也有积极的一面，起码使人看到香港的制度也有合理的东西，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后来宝安县委通过了一个决定，叫做“利用

香港，建设宝安”。具体做法是利用香港与宝安跨境的地理区位优势，借进出香港的机会，把化肥等国内买不到的生产资料物资带回来，把国内不收购的农产品带过去。这是我最早看到的国内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自己的一个最初萌芽。当时主要还是埋下了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利用资本主义当中合理的东西的问题，这是最早的萌芽。

我们要不要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当中合理的东西？我们的改革叫“危机改革”，为什么？因为如果好好的，谁也不愿意改，而且改革要触及既得利益。但是，等到原来以为很顺的路走不下去的时候，就逼着要改革，逼着要做变化，逼着上层建筑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所以，我相信中国的历史，写中国改革要从1978年开始，但要探寻它的根源，农村改革和开放可以追溯到1961年。虽然当时的开放是非正式的，但是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没有实事求是，不从僵化的教条当中解放出来，这些局部性调整遇到问题就退缩，就不会变成新的制度和新的经济模式。十七大重新提思想解放，广东现在举这个旗，开展新一轮思想解放，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经过“文革”后的痛定思痛，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开始从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思考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之后的一系列解放思想之举，奠定了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党内德高望重的陈云先生1978年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使当年局部短暂的调整有新的情况。包产到户1961年搞过，有的省搞到40%、50%、70%左右，但是形势一好又开始回去了，又批斗干部，又改了。但是当时1977年安徽又是大旱，那个时候又秘密地包产到户了。我去了安徽当年的农村调查，我们访问了当年搞这个的小伙子，他说18户人家，这个地种不下去会饿肚子，这18户秘密签字画押。第一是首先谁也不透露。第二一旦消息走漏，如果有干部被关起来，18户人家轮流送饭。第三万一不幸，如果有人走资本主义被枪毙，18户人家轮流抚养他家的后代。你说都改到这个地步，农民要种地都要搞秘密，这个今天的年轻人读起来觉得很荒唐的。

有一条，中央思想路线改变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加上一批有改革意识的干部。首先凤阳县委书记支持，省委书记是万里，说共产党员要走群众路线，有不同意见好，一个队也不算是走资本主义嘛。农民赞成什么？走群众路线。邓小平坚持看一看再定，说不要急急忙忙下决定。华国锋当时组织农村工作的人开会说，这么搞省委同意吗？他们说省委常委同意的，华国锋开常委会马上叫电话接通万里，当场就问万里同意不？万里说他同意的，省委开会决定的。华国锋说，既然省委同意就不要急急忙忙纠偏。那是 1978、1979 年发生的事情。

1979、1980、1981 年好了，慢慢地生产方式被接受了。土地是共有的，但是大家一起经营，全世界都没有这样。要么是公，要么是私，中国逼出这样共有的资源承包给私人种，这个本本上没有写到的。但是解放了农民、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什么不可以呢？当年农产品的供应，我记得世界银行一个代表访问中国，了解农村改革政策非常佩服。当时中国是平均地分配了贫困，过年的时候几两油、几两花生都分配。我去边疆四年，黑龙江物产丰富一点，我记得我背 50 斤黄豆从东北回家孝敬父母，当时父母非常高兴。50 斤黄豆是很多的，当时上海一户人家票里面才几两。

包产到户后中国农产品供应缺乏一下子就解决了，这就是三中全会讲的。都是思想路线不同，同样的实践慢慢地就被中央承认了。先不要动，先看看再说，然后一号文件，再一号文件。我们那时候每天就调查研究，把做对的事情报告给中央，然后编制文件肯定它。那个时候 1980 年有一个 75 号文件争议非常大，当时的提法说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产到组，条件好的地方还可以搞集体经营，也可以。传达到农民那里，农民说这个文件好，“可以、可以、也可以”。

其实中国不用再一刀切那样做了。这么多人，这么伟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地域差别为什么要说这样不可以呢？如果中国早采取这个做法早就发达起来了。我们采取这一路线改革开放对以后就有决定性影响。1976 年毛主席逝世政策有所松动，香港谣言出来了，说伊丽莎白登基大赦天下，跑到香港就可以留下来，跑到香港去什么都不用怕，结果当时宝安又集结了几万人，边防部队都挡不住啊。我在深圳调查的时候很多深圳的政协委员，都是香港来的投资者，以前是我们这里跑出去的农民，你跟他谈得高兴，西装一脱，肩膀上就会看到狗咬的痕迹，真的是从深圳河游过去的。当年没有办法，只有跑到那边。但是这么多社会主义人民往资本主义方面

跑，当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派到广东的省委书记，手头有责，急急忙忙赶到宝安开座谈会，问当地干部为什么农民要往香港跑？支部书记说，农民去了以后一年往家里面寄的钱，家里可以盖房子。习近平的父亲当时是老同志不能接受说资本主义好，干部说好就要撤了他，村支书说，不撤也不干了。但是习仲勋回去一想认为人家讲得有道理，再找他谈，问在那边到底干什么可以挣那么多，比过去的十年还多？深圳有个罗芳村的人跑出去了一半，从深圳到香港，在香港又建了一个罗芳村，香港的罗芳村是我们这边的罗芳村 100 倍的人均收入，这是当年。村支书讲，第一这边的人过去不光种地还打工，打工很挣钱。这个当时是“思想解放”，我们老觉得资本主义是剩余价值，是剥削工人，怎么会挣很多钱？第二市场活跃，农产品可以卖很高的价格，不像国内这样的收购价。其实就是一片经济自由，今天看没有什么奥秘。习仲勋当时在想这样的问题，当时的第一书记杨尚昆，这两个人在一起商量。习仲勋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提出，当然不是说把我们的人放过去，而是说我们是不是开放一块地方让香港来开工厂也让农民去打工，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当时的中央主席华主席，没有表态。当时邓小平是副主席，散会之后他说对这个事情感兴趣，让习仲勋再好好讲讲。习仲勋说要划一块地让香港人来这边开工厂，为了不冲击过去的经济体制，当时承诺所有的产品全部外销。邓小平听了以后说，这个想法好。但是觉得还要师出有名啊，跟其他地方要分开，叫什么呢？邓小平说，这个就叫“特区”。后来中央有人说，之前就“陕甘宁”叫特区，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又搞一个“特区”出来，那算什么？中央马上起草文件进行更正，所以我们就改为“经济特区”。

然后中国就有了另外的面貌，开放了。这个事情回过头看历史，我们做研究工作的觉得是最大的教益。为什么不实事求是？明明是落后了。你们就是本本，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我们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先发展，当时要想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大家想问题办事情不再在框框里面，可以试一试，可以不一步到位，可以先做一点，改一点、改一点、改一点。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想都不要想，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改革开放。

当然从我们的专业角度看，改革开放是重新划定权利。人民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什么提倡什么禁止？是重新划路线。四个领域重新界定。

第一层是公共财产可以给私人使用，可以给私人受益，可以让私人转让。没有这个哪儿有统一市场。珠海市当年发展的招数是地，如果地不能转让如何划拨，谈都不要谈。后来不光集体土地可以私人承包，国有企业也可以私人承包，国有商业也可以私人承包。这是我们大概理解看到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不但资源可以自己用而且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今天看来是平常的东西当年是不得了的。参加几次改革就是这一关过不去，转让土地是非劳动所得，在当时是剥削，是旧社会，是资本主义，你怎么可以非劳动所得呢？我们今天懂了，房子买来买去出租，资源可以利用。水在我手一毛钱你说一毛五，可以赚。市场经济是一个转让经济，我的东西可以不用，因为你用得比我好。比如说股民，这个钱为什么自己不办工厂，自己办工厂的效果不如上市公司好一些，这个时候就交给上市公司，自己保留股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很多的生产力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条最厉害，中国人能不能创业呢？你看市场有个需求，就去找资源，无论是自己的、兄弟的、同学的、银行借的，还是风险投资的、别的商人投资的。找到资源就可以创业，创业可以提高就业，鼓励创业。汪洋专门去访问马云，马云就是创业者，他变成了为世界上中小企业服务的网络企业阿里巴巴。这个事情当年来说是不得了的。但是都认为这个是资本主义、资本家。这一条不冲破，中国生产力一大半没有了，你回想一下中国这一条路真是来之不易啊。1980年有一个广东农民陈志雄，广东人要吃新鲜鱼，那时候没有鱼吃。他就把西江上游的水淹田包200多亩，就养猪，用猪的肥料养鱼，循环发展。当时中国有一个说法是雇7个人是小业主，雇8个人就是资本家，对劳动人民有剥削行为，资本家是剥削阶级，子女上学、提干、找对象都有问题。这个叫“七上八下”，但陈志雄卖鱼很好，雇工超过了8个人，怎么办？从广东理论界再到北京，人民日报社组织调查讨论，敞开思想来谈，不要把他看做妖魔鬼怪，也不看他干什么。当时广东的开放思想贡献非常大。

中央要整党，当时很多党员也雇工，共产党你是先锋队你还雇人，这是很复杂的高层的思想斗争。有一个重要的干部李昌（人名、音同）是非常硬的干部，在中纪委坚决不同意，最后经过邓小平同意整党不要把雇工问题列入，不肯定也不反对。最后1987年中央文件写清楚雇工是社会主义